

ZHONGGUO GONGCHANDANG
ZHIZHENG LILUN
TIXI

中国共产党 执政理论体系

王章维 主编



■ 上海人民出版社

D25
W457

ZHONGGUO GONGCHANDANG
ZHIZHENG LILUN
TIXI

中国共产党 执政理论体系

王章维 主编

王章维 刘明华 王盛开 王伟 沈传亮 编著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中国共产党执政理论体系/王章维主编.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ISBN 7-208-06051-7

I. 中... II. 王... III. 中国共产党—执政—研究

IV. D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02555 号

责任编辑 秦建洲

封面装帧 甘晓培

中国共产党执政理论体系

王章维 主编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天马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19.25 插页 2 字数 327,000

2006 年 3 月第 1 版 200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250

ISBN 7-208-06051-7/D·1048

定价 32.00 元

导 论

——努力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建立在对客观规律的 深刻认识和自觉运用的基础之上

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建立在对客观规律的深刻认识和自觉运用的基础之上，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在党的建设方面提出的核心要求。要做到这一点，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执政理论与我们党执政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总结历史经验和现实经验的基础上，开展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不断完善我们党的执政理论体系。”^①作为在大学工作的理论工作者，我们希望本书的研究能对这一工程有所裨益。

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后的一项根本建设。“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推进党领导的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联结点。”^②执政理论体系的研究是这项工程的核心。一年多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已多次阐述这个问题的重大意义和基本思路，提出要组织广大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进行系统研究，不断取得新认识、新成果。2004年9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四中全会及其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凝聚了全党智慧，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半个多世纪执政治国的主要经验，进一步明确了加强党的执政建设的指导原则和总体目标，确定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主要任务和各项部署。历史将证明，这个文件将同邓小平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中共中央关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一起，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里程碑式的文献。如果说邓小平1978年的《解放思想

^① 胡锦涛：《认真总结执政能力建设经验，大力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载《人民日报》2004年7月1日第一版。

^② 《人民日报》社论：《以提高执政能力为重点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三周年》，2004年7月1日第一版。

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吹响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号角，1993年中共中央作出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突破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最重要的一个禁区的话，那么，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可以说指明了中国共产党执政改革和发展的方向。这个文献，将成为中国共产党今后自身建设主题和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的切入点。

究竟应该怎样开展这方面的研究，从何着手研究，主要研究哪些问题，都是需要认真思考的。以下提出我们的基本思路：

一、关键在不断认识、研究和把握执政规律

研究的本身不是目的。开展对党的执政理论体系的研究，根本目的是要“不断取得新认识、新成果，不断认识和把握执政规律，努力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建立在对客观规律的深刻认识和自觉运用的基础之上”^①，实现党的执政系统的不断优化。

所谓“规律”，即是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本质联系和必然趋势。任何事物都有自己的发展规律，执政党的执政也是如此。规律因为反映了事物的本质联系和发展趋势，所以把握规律就能够高瞻远瞩，就能够驾驭全局，就能够作出正确的战略决策和确定正确的方针政策。作为一个在13亿人口的大国里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只有正确地认识执政规律，自觉地运用好执政规律，才能实现自己的执政宗旨和执政目标。

同一个人的成长一样，一个政党的发展和成熟也是在实践中不断前进的。而且由于人们认识的局限性和相对性，人与政党的成熟总是相对的。中国共产党经过十余年艰苦奋斗，直到抗日战争的中后期，才基本认识和掌握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规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在经过了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代表的几代共产党人的集体奋斗与探索之后，中国共产党才初步认识了领导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规律和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里执政的规律。

说到成熟，对于一个人来讲，主要不是在生理上的，而是在心理上的，在于他对世界和人生的认识，对个人与社会关系的把握，对棘手问题的处置方法。由于政党都是由活人组成的，所以政党的许多特点和人相似。对于一个政党来说，其成熟与否主要不在于有多少党员，也不在于这些党员来自何方，而在于这个党的领导核心对社会发

^① 胡锦涛：《认真总结执政能力建设经验，大力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载《人民日报》2004年7月1日第一版。

展规律的认识和把握,在于对世情、国情和党情的认识,以及对战略方向的选择和重大问题的处置能力。毛泽东曾多次说过,我们要“走历史必由之路”。这个“历史必由”,就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执政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国情极其复杂的大国里。对任何政党和个人来说,在中国执政都是巨大的挑战。罗伯特·劳伦斯·库恩在《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中有过这样一段话:“1989年6月24日,江泽民作为新的总书记被介绍给全国。《纽约时报》报道称,他‘看起来有点闷闷不乐,眉头微微皱着’,并补充道,‘他可能正在思考一个令人不安的现实:他所就任的职位危如累卵。’”^①江泽民同志对政治局的同志们也多次说过:“我感到担子很重。”从十三届四中全会到十六大,在江泽民同志担任总书记的13年中,他和以他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出色地完成了党和人民的重托,显示了高超的领导能力和执政能力。在这13年中,他们不但“改变了中国”,而且在执政经验、执政理论方面,提出了创新点,留下了宝贵的成果。是江泽民同志,在坚持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高瞻远瞩地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要高度重视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为跨入21世纪的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指明了政治方向。

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首的新一届党中央,更清醒地认识到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大意义,以全会的名义作出《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提出执政理论体系研究的任务和方向,提出要努力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建立在对客观规律的深刻认识和自觉运用的基础之上。只有这样,党的领导和执政才具有科学性、前瞻性、预见性,才会达到自觉,实现从必然王国向新的自由王国的飞跃。

从来也没有什么先知先觉。中国共产党虽然是伟大的党,但不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党,不是神党。要认识和把握客观规律,就要不断学习,不断认识世情、国情、党情,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深入开展理论研究。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始终是我们进一步探索客观规律的思想武器,毛泽东开创和毕生实践的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始终是我们进一步探索规律的思想准则,邓小平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向前看和江泽民提出的与时俱进的观点,始终应该成为我们探索规律的座右铭。

^① [美]罗伯特·劳伦斯·库恩著,谈峰、于海江等译:《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1月版,第148页。

二、深刻认识我们党执政中的几次转变和角色转变面临的挑战

要研究好党的执政问题,还要深刻认识我们党在当前中国社会中的角色定位以及从政的特点。而要做到这一点,又要深刻了解中国共产党在数十年执政中经历的一系列重大转变。

在半个多世纪的执政中,中国共产党经历了和正在经历着许多重大转变。我认为主要的转变有:从局部区域(革命根据地)的执政到全国范围(除台湾省和港澳地区)的执政;从革命战争时期的(军事化和半军事化的)执政到和平的经济建设时期的执政;从实施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执政到实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执政;从相对封闭的(或曰主要面向国内的)执政到实行全面开放、应对全球化的执政;从以阶级斗争、阶级意识为主的执政(专政)到实施公共治理(管理)的执政。

这些转变将在专门的文章里论述,在此不赘。这里,只谈谈最重要和最需要研究的两个转变:一个是从一个革命党到一个领导现代化建设的党的转变;另一个是从实施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执政到实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执政。

先谈第一个转变。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为革命应运而生的党。共产党人从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富强的新中国,是中国共产党的最低纲领,是中国走向崛起的前提。由于近代中国社会的特点,中国革命的基本形式就是武装的而非和平的。因这一点而否定中国革命的意义是没有道理的。什么叫“革命”?革命就是打碎旧制度,就是阶级斗争,就是造反。它是以破坏旧秩序、镇压和专政为特征的。

革命时期是社会发展的非常时期。在中国革命中,被动员起来的主力军是劳苦的工农大众,是社会最底层的人们。在这个革命中,不讲什么法治、秩序,强调的是纪律、集中和统一,人们习惯的是首长、命令和服从。经历战争这个熔炉冶炼的人们,一旦由战争转向和平,由打仗转到建设,由战斗队转变为工作队,由军人转变为各级政府官员,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就自然带来诸多新问题。也就是过去常说的,“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

新问题是什么呢?首先是思维方式和认知方式问题。因为从事长期的阶级斗争,经历的是血雨腥风,所以坚信“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坚持“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观察一切”。不仅对社会群体,就是对党内矛盾,都上升到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高度认识。而且最重要的,始终强调斗争哲学,强调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政治、军

事以及思想路线的斗争与文化的批判相互呼应,成为那个时代的特征。在这种环境的熏陶下,对领袖、英雄、军人、强权的崇拜和泛军事化,成为社会文化的主导。“文化大革命”再清楚不过地反映出那个时代的特征。

因为我们的革命战争是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又是在广大的落后的农村和山沟沟进行的,革命的主力大多为不识字的农民。包括成为干部的那些同志,文化理论素质也不高、视野比较狭窄。加之长期实行供给制的习惯影响,使许多人对有产者、对知识分子,以及对所谓的资产阶级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实际是城市文明),产生了一种本能的复杂反应。而“打江山坐江山”和以功臣自居的自我认识,使得一批走上领导岗位的干部把公共权力视为私物。

以这种思维方式指导大规模经济建设和管理国家,在行为和执政方式、执政决策上就出现了不少问题,办了不少蠢事。比如对麻雀的围剿、对法治和工资制的蔑视、对供给制和平均主义的推崇、对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的绝对排斥、搞经济建设实行“人民战争”、“大会战”的形式,以及在社会治理中实行命令主义、在思想教育和文化领域不断开展大批判等等,这说明不清楚和平建设时期和战争时期到底有什么区别,不懂得领导经济建设和治理国家与组织战争不是一回事,更不懂得社会主义到底应该是怎么一回事。用邓小平的话说,就是搞了半天社会主义,还没有闹清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什么。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同志多次要求我们全党反思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江泽民同志要求我们全党要解决好四个“如何认识”的问题,特别是如何认识当代资本主义和如何认识当代社会主义,都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解决好这些问题的本身就是清理所谓革命党的消极影响,实现向一个领导现代化建设的党的转变。

自 1949 年执政以来,我认为我们党有两个大问题没有处理好,或者说还没有破题。一个是对待农民问题,一个是对待知识分子问题。前者连着封建主义,后者连着资本主义。出于这样的认识,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均把这两个阶级视为改造的对象。毛泽东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他实行的是企图通过组织化和提高公有制程度,解决、克服农民的劣根性。而对所谓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就是实行思想批判加劳动改造,实行和工农相结合。从历史来看,这些做法并非没有一点根据。要建设一个新国家,必须解决这些问题。问题是,农民既是中国现代化的主力又是中国现代化的重点和阻力。没有中国农民、农村的现代化,中国整个社会的现代化就是一句空话。如何把阻力变为动力,是摆在我们党面前的课题。

而那些与西方资本主义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知识分子，正是中国获取现代化必需的宝贵的知识、技术、资本的来源。知识分子从来就具有较强的独立性和自由性。这是知识分子的优点。因为只有独立性和自由性才是创造力的源泉。但对执政者来说，这就往往是遭讨厌的缺点。

在人类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农民问题和知识分子问题在各国都是个复杂问题。如何发挥他们的优势，克服他们的弱点，是执政者的课题。今天“三农”问题的棘手和教育理念、制度管理上的混乱，恰恰折射出这两个问题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特殊地位。

还有，最近的《参考消息》曾发表几篇外国对中国类同的评论。他们在承认中国取得巨大进步的同时，几乎一致地认为中国在两个方面与发达国家还存在着巨大差距：一个是科学技术领域；另一个就是管理方面。这是切中要害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是现代生产力的发动机。诚然，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我们党为发展科学技术和教育作了大量工作，提出了“科教兴国”、教育要“三个面向”和科技创新战略。但是，我们还没有建立一套科学的合理的体制和制度来推动和实施这些战略，还没有形成一种科学创新的人文社会环境，我们的教育理念、教育体制、用人制度和政府管理还存在很多值得反思和深思的问题。有人说中国教育上的问题实际上反映了政治体制和管理改革的滞后，“三农”问题折射出的是中国崛起的“软肋”，这话不无道理。

从实施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执政到实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执政转变，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同样是一场深刻的革命。

新中国成立后，在经济上我们学习苏联，开始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模式。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战争中形成的高度统一和严格纪律性，很适合实施这种经济建设模式。所以，很快就进入了角色。应该说，在实行计划经济的 20 多年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艰苦奋斗，取得了令人难忘的一批成就，特别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初步奠定了工业化的基础。但是，长期以来，几乎所有的共产党人都是把计划经济看成是社会主义的天经地义，把市场经济看成是资本主义最重要的特征，把私有制加市场经济，视为资本主义的万恶之源。到了 20 世纪 60~70 年代，疯狂的“文化大革命”使中国经济濒临崩溃。正是“文革”痛苦的磨砺，使中国共产党人开始重新思考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市场经济的属性与特征，也开始反思我国的发展模式和我们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

政治经验十分丰富的邓小平提出了可以说永垂史册的两个政治命题：一个是建

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个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论人们如何理解它们的内涵，这两个命题却指明了中国改革和政治发展的方向。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执政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重大理论突破。中国共产党本身在新世纪的建设，实现从狭隘意义上的革命党向实行公共治理的执政党的转变，也将按照这个方向完成。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将发扬与时俱进不断进取的探索精神，在总结以往执政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执政模式，科学地确定自身的定位。

要深入开展对党的执政问题的研究，除了要深刻认识这些转变的原因、结果和带来的挑战外，还要准确地了解党自身的定位。

所谓“定位”，也可以说是“社会角色”。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社会角色，政党也如此。正确地认识和把握好自己的社会角色，对一个人、一个政党的发展和作为极其重要。

当前中国共产党最基本的社会角色就是“领导核心”和“唯一的执政党”。所谓“领导核心”，就是整个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领导核心。毛泽东说“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就是指这一点。所谓“唯一的执政党”，是说虽然我们现在的政党制度是实行的多党合作，但八个民主党派只被称为“参政党”，都处于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唯一执政的是中国共产党。

既是领导核心又是唯一的执政党，这就是当今中国共产党基本的社会定位、基本的社会角色。这种角色定位，要求我们在研究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时，一定要把领导与执政的关系、领导能力和执政能力的建设问题同时考虑进去。

2004年我曾在《北京日报》发表一篇小文，题为《关键是要提高和整合两种能力》。我在文中写道：“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我认为最关键的是要提高和整合两种能力：一种是领导的能力，一种是执政的能力。何以如此呢，就是因中国共产党在今日的中国担负着两种政治角色。一种角色就是它是中国人民和各项事业的领导核心，这种领导核心地位是历史形成的，没有任何力量可以代替；另一种角色就是它又是当今中国的执政党，在中国大陆方面又是唯一的执政党。这两种政治角色就决定它必须具备和不断提高这两种能力。”我还认为，“政党的领导能力与执政能力不是一回事，它们既有关联又有区别。在我看来，领导能力最重要的就是统率能力、战略决策能力和凝聚（或者说是和谐）社会因子的能力；而执政能力最重要的就是对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能力、统筹能力和服务能力。”过去我们在党的建设方面，主要是强调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这无疑是对的。但是，后来江泽民同志开始强调执政能力建设问题，这也是非常对的、及时的。因为执政后的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主要体现在执政上，主要是通过执政来实施，因为“党执政以后的全部实践活动，都是围绕着执政展开，都是围绕着提高执政水平、巩固执政地位来进行的。执政能力建设既是党自身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对党各方面建设起牵头管总作用的。”^①

中国共产党的这种政治角色是当今中国政治最重要的特点。所以，研究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其他中国政治问题，必须充分考虑到这个特点，否则无法说清问题。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也强调，“只有不断解决好这一课题，才能保证我们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和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

三、珍惜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基本经验

不断正确地总结经验是中国共产党不断取得成功的基本奥秘之一。在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对 55 年来中国共产党执政的主要经验进行了总结。共 6 条：

第一，必须坚持党在指导思想上的与时俱进，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

第二，必须坚持推进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增强社会主义的生机和活力。

第三，必须坚持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把发展作为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

第四，必须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第五，必须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

第六，必须坚持以改革的精神加强党的建设，不断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正如《人民日报》社论讲的，“这些主要经验，突出了把握执政规律、提高执政能力、完善执政方略、改进执政方式、巩固执政基础、完成执政使命等重大问题，是党执政经验的深刻总结，也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指导原则”^②。这些基本经验很值得我们深入

^① 《人民日报》社论：《以提高执政能力为重点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三周年》，2004 年 7 月 1 日第一版。

^② 《人民日报》社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纲领》，2004 年 9 月 21 日。

研究和阐发。在本书中,我们将这些经验分解到各章中作了初步阐述。我们认为,这些经验关键是要通过宣传教育化为全党的意识和行动。

四、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

所谓系统,就是全面,就是缺一不可。执政本身就是一个涉及方方面面的系统行为。党的执政理论也是一个涉及多方面的体系。因此,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必须视为一项系统工程。

近几年,中央高层和理论界对执政理论体系的内涵作了探讨。2004年6月30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向全国党员和党务工作者发表讲话时提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包括执政理念、执政基础、执政方略、执政体制、执政方式、执政资源等主要方面。”不久,他在2004年8月22日的一次讲话中在此基础上又加上了“执政环境”,提出,“要以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为重点,从党的执政理念、执政基础、执政方略、执政体制、执政方式、执政资源和执政环境等方面进行努力,全面加强和改进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和制度建设。”至于学者们提出的就更多些。我们认为,最基本的还是执政理念、执政基础、执政方略、执政体制、执政方式、执政资源六个方面,所以本书的设计主要安排了这样六章。这样写并不是说执政环境以及学者们提出的其他方面不重要,而是认为这六点是最基本的。说其基本,是认为这几个方面,涉及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最重要的内在要素和执政党执政的最一般规律。

提出执政理论体系的这些方面,究竟如何正确地理解和实现它,是研究和讨论的重点。本书以主要篇幅对这些问题进行了研究。主要从宏观史的角度(包括中外近现代史、中共党史党建史、政治制度史、思想史和政党史等)和运用部分典型案例,阐释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执政基础、执政方略、执政体制、执政方式、执政资源等重大问题,包括概念的理解和研究动态。同时阐述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说明它为什么是一项系统工程。也结合当代中国实际,探讨了解决好这些问题的难点和重点。在最后一章中,以“研究和借鉴其他国家执政党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为题,介绍了外国若干有代表性的执政党执政的经验和教训。

五、抓紧解决执政能力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

我们认为,这是胡锦涛总书记向全党提出的执政能力建设中最实际的要求,也是在执政能力建设研究中必须认真调查研究和着力探索的课题。

解决执政能力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首先有一个认识问题，即哪些问题是“突出问题”？我们党有6800多万党员，有成千上万个基层组织，各地、各级、各部门、各系统的情况各不相同。中共中央《决定》中的基本评价是：“我们党在实践中锻炼得更加成熟、更加坚强，党的执政能力同党肩负的重任和使命总体上是适应的。”这个评价应该给我们以信心，因为党中央掌握的信息毕竟比我们下面的个人全面得多。

在存在的问题方面，党中央在《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提出了一系列“不完善”、“不高”、“不强”、“不适应”、“不端正”等，提出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主要任务是“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这些可以说就是提高执政能力的重点和存在的突出问题。

党的执政能力不是与生俱来的。能力建设和提高也不是一朝一夕的。既有组织、制度和体制方面的问题，更有理论、理念和党员个人（特别是干部）的素质问题。

在执政能力建设方面，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这样三个方面：一是宏观洞察和战略决策（策划）能力；二是统筹和整合能力；三是适应能力。

既是领导，就要有过人之处，能够比别人站得高些、看得远些、想得深些。总之，本事要大些。作为一个世界大国的执政党，又处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首要的就要具备高超的宏观洞察和战略决策能力。中国的国际地位和民众期望值不允许我们在重大问题上有任何闪失和失误。国际局势给予中国的战略机遇期极为宝贵。历史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执政者只要在大的方向上不出问题，国家和民族就有希望。而战略方向的选择和战略决策上的得失，其影响甚为深远。回顾我们党执政的历史，我认为有两大决策对中国现代化和中国崛起的意义怎样估计都不为过。一是从一开国就决定建立一个完整的工业化体系；二是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决定发展原子弹、氢弹等战略核武器。毛泽东时代的这两大决策是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完成的。试想，像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如果到今天还没有一个比较完整的工业化体系怎么能实现现代化呢？我们不是一个小国，不能指望别人的恩赐。如果我们今天还没有“两弹一星”，我们在国际上会是什么地位呢？没有这个光有13亿人口也没有什么分量。所以，21世纪的中国人应该永远铭记那些决策者和建设者的伟大功绩。这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伟绩。

我们也有两大决策失误的教训：一是没有控制住人口的增长；二是没有控制住资

源与环境的巨大浪费和破坏。想一想中国大地上涌动的人群和失业大军,看一看几乎干枯的黄河和已经污染的长江,生活在 21 世纪的中国人将在整个世纪中为这两个决策的失误付出代价!

现在的问题是,提高宏观洞察和战略决策(策划)能力,不仅是指(甚至主要不是指)我们党和政府的最高层,他们的能力是可以信赖的,主要的问题是在省、市、县一级领导。因为中国的一个省、直辖市,甚至一个专区、一个县,就相当一个国家,而且省、市、地区发展的独立性越来越强,这就对这些级别的领导者和官员的宏观洞察和战略决策(策划)能力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他们的这种能力如何,直接关系到所辖地区的发展水平和百姓的福祉。我们在科学发展观方面出的问题,也主要是在这些层面上。近年美国总统布什曾用“疯狂的发展”来形容现代的中国,这当中就包含着对我们的告诫。最近又听说有上百个城市规划者要把自己建成“国际化大都市”,更让人感到可怕。发展是硬道理没有错,问题是怎样发展。近年来大量的实例告诉我们,领导者、决策者凭道听途说、跟着感觉走和头脑发热作出的决策失误成为百姓最痛恨的事情之一。其原因既有素质问题,更有制度问题。浪费百姓和纳税人的钱得不到追究是管理体制的漏洞之一。例如,北京市近年重建了在 1957 年拆掉的永定门还自诩为政绩。且不说为什么在 1957 年拆掉和现在为什么要重盖,就是现在重建的质量也让人大为怀疑。这不,也就是一年工夫这个不伦不类的“永定门”又再大修。还有北京西客站的建设,用老百姓的话说,还没使用就成旧的了。党中央、国务院鼻子底下都这么干,更何况那些天高皇帝远的地方了。

作为一个执政党,特别是作为一个在 13 亿人口大国里执政的党,其统筹和整合能力也极其重要。无论任何时代,社会都充满了矛盾和利害冲突,而且层出不穷。家大、业大就更有其难处。特别是在社会转型的今天,由于生存竞争的激烈和新治理制度还不完善,中国社会已进入矛盾和冲突多发期。作为领导者和执政者,必须承担社会责任,有能力面对、解决各种矛盾和问题。

早在上个世纪 50 年代,毛泽东在著名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论十大关系》等著作中,就提出了统筹兼顾和整合社会的思想。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里说:“这里所说的统筹兼顾,是指对于六亿人口的统筹兼顾。我们作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为什么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难道还有人不知道我国有六亿人口吗?知道

是知道的，不过办起事来有些人就忘记了，似乎人越少越好，圈子紧缩得越小越好。抱有这种小圈子主义的人们，对于这样一种思想是抵触的：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并且尽可能地将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这个伟大的事业服务。”毛泽东还说，这是一个战略思想。“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①虽然后来的发展并不如意，但今天细细品味这些思想，还是很有价值的。新一届党中央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其意也在于此。

统筹兼顾，说白了，就犹如一个家长要照顾到家庭的每个成员。政治学上说，国家是超然于社会之上的权力。执政者就是要运用这种权力，统筹兼顾，整合社会。必须看到，矛盾是客观的、永远都会存在的。社会乱子、“闹事”也会时有发生。可我们有的领导者、执政者，要么故意回避矛盾，要么在矛盾和乱子面前惊慌失措，要么滥用权力粗暴压制。总之，如何正确地合理地处理各种矛盾，有没有整合和调和社会因子的能力，将时时考验着每一个领导者和执政者。

三是适应能力。作为一个执政党，要完成执政使命，就要努力适应执政环境，不断提高应对挑战的能力。

环境是客观存在。生物界生存竞争的法则同样适用于执政党。即使得到大多数人拥护上台的执政党，都会面临各种各样的挑战和各种复杂的执政环境。我们强调适应能力，还在于环境和条件总在变化，新问题和新挑战层出不穷。同人的求生存一样，政党的适应能力也是其基本的生存能力之一。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是最具适应能力的政党。这也是她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成功的秘诀之一。究其原因，一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理想和信念总能吸纳一代又一代社会菁英；二是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地用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指导自己的行动；三是中国共产党特别善于总结和吸取经验和教训；四是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和与时俱进；五是中国共产党特别注意通过保持自己的先进性而赢得群众。

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说过：“对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来说，一党制和多党竞争制，究竟孰优孰劣，政治学论家们已经花费了大量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 1977 年 4 月版，第 456～457 页。

的时间和笔墨,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过就政治发展而言,重要的不是政党的数量而是政党制度的力量和适应性。”^①适应性首先来源于理论和思想的先进性和进取性。邓小平也多次说过,思想僵化、迷信盛行和不思进取,是要亡党亡国的。“在党内和人民群众中,肯动脑筋、肯想问题的人愈多,对我们的事业就愈有利。”^②所以,不断提高我们党的适应能力,是执政能力建设的基本素质之一。

解决执政能力建设存在的突出问题,关键还是在党自身的建设。这既是基础,也是前提。

中国共产党始终高度重视自身建设。特别是从毛泽东那一代起,在党的建设方面提出了一系列重要原则,创造了行之有效的方式方法。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从新的角度提出党的建设课题,不仅使中国共产党治国和领导建设的理论得到重大发展,而且使党的形象大为改观。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江泽民为首的党中央针对党内外新变化,在党的建设上采取了一系列新举措。最重要的是在理论上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制度上制定了一系列党规党法;在行动上开展了以“三讲”为核心的教育。党的十六大之后,以胡锦涛为首的新一届党中央在继承前者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着党的各项建设。目前正在开展的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为主题的全党范围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是这一时期党的建设的重要环节。但是,目前党的建设还存在着一些令人担忧的状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问题上:

1. 党员和干部的政治信仰弱化与缺失令人担忧。

共产党靠什么保持先进性?靠什么来凝聚?历史证明,主要不是靠规章制度和纪律,而是靠自身的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靠的是要为祖国和人民干一番大事业。共产党员之间之所以称“同志”,就在于他们因伟大的理想和信念而志同道合。

信念是无穷的力量。看一看麦加人头窜动的朝圣者,听一听科隆大教堂牧师动听的释经声,再看看山林寺庙里常年不绝的香火,人们怎能不为信仰的力量而震撼。我是在大学全过程经历“文革”的一代人。“文化大革命”初起的狂热,“八·一八”伟大统帅毛主席检阅红卫兵的宏大场面,恐怕只有亲历者才会感触到那信仰的力量。今天,一切向“钱”看的人,在火热的经济生活中却对我们党倡导的政治信仰表现了空

^① 塞缪尔·P·亨廷顿著,王冠华等译:《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1989年7月版,第388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143页。

前的冷漠。不用举例，现实生活中的人们都会感觉到这一点。

有一位研究生在写给我的信中讲：“我想，了解那些学生党员的人，其实莫过于我们这些天天和他们相接触的号称同学的。如果那些新闻工作者们听了我们对于学生党员的态度，大概只会把我们当作反面典型处理，然后再找一些先进分子继续他们的光明报道。据说文科学生对于入党的态度，大多是为了有利于自身发展，或者为形势所迫，诸如为了考取国家公务员以进入政府机关部门，诸如此类。我不是文科学生，没有发言权，也许我所听到的只是片面之词，不足为据。但是作为理科学生而言，我想多少我是有发言权的。至少在我所接触的圈子里面，大多数人对于学生党员的态度实在多少跟我有些类似，类似的阴暗，认为他们或多或少有些个人目的。抬举而言，他们或许能把这个纲领那个著作倒背而出，但贯彻在行动中，其实他们和我们没什么两样——至少他们的作为不是我所期望见到的党员形象。”

在我们这个时代，比较而言，青年学生还是比较单纯和坦诚的。学生党员的状况尚且如此，别的地方、别的行业的党员就更难说了。这里关键还是信仰和信念问题。过去的革命先烈视死如归为哪般？张闻天、彭德怀、邓小平、刘少奇等在蒙冤的时候又是怎样想的？在我看来，他们把党视如父母和生命，就在于他们树立了坚定不移的信念！

信仰的缺失其实还主要不在年轻学生，某些成年共产党员，甚至入党多年的干部，恐怕骨子里也已经不再相信共产主义了。如果说学生通过政治教育还多少接触了马克思主义经典的话，那些成天忙忙碌碌的干部又有多少人自觉地研读过《共产党宣言》和《毛泽东选集》、《邓小平文选》呢？人们不难从他们追逐时髦和庸俗，笃信封建迷信，特别是从他们说一套做一套的伪劣作风中找到答案。

党的官员的腐败有着多种多样的原因。大量的例子说明，政治信仰的缺失往往是最重要的一环。头几年因贪污腐败而被处决的河北省国税局局长李真，在其《刑前对话实录》中表露了自己的内心世界。他说他开始从政的时候，也曾想作一个焦裕禄式的干部，希望像焦裕禄那样带领百姓致富。但是，面对权、钱、色的诱惑，他失去了入党时确立的政治信仰，最终在权力、金钱和美色这三道“关口”前倒下。

李真在刑前还说过，一些官员出事，不是出在制度上，而是出在官员缺乏遵守制度的意识上。他说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没有什么规章制度，一首《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把党员、干部，包括普通的战士给约束住了。他这话的确应该引起我们的思考。今天到底应拿什么来约束我们的党员和干部呢？在今天我们党长期执政的情况下